

习兵战不如习商战

——从《盛世危言》看郑观应的经济思想

聂好春

(华中师范大学 中国近代史研究所, 武汉 430079)

[摘要] 郑观应是从买办转化为民族资本家的代表人物。郑观应有关经济思想的论述, 倾注在其著作《盛世危言》一书中。他以历史的发展眼光对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进行了批判, 提倡“振兴商务”“以商立国”; 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 抵制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 维护民族的经济利益; 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 建立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在唤起民族觉醒, 探索民族振兴之路, 推动近代工商业发展, 捍卫国家经济利益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

[关键词] 《盛世危言》; 郑观应; 经济思想

[中图分类号] F 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917(2006)03-0067-04

郑观应(1842~1921年), 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人, 杰出的实业家, 改良主义思想家。曾任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 并捐资获道员銜。因不满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 抱着“初则学商战于洋人, 继则与洋人战”的新思路, 于19世纪70年代自营贸易和投资轮船公司。后担任过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和上海电报局会办, 汉阳铁厂、粤汉铁路公司总办。由于郑观应长期投身于经济实务, 又较多接触到西方的经济理论, 所以他的经济思想十分丰富, 且具有系统性。郑观应于1873年出版第一部著作《救时揭要》。后来他又增写《易言》共36篇, 由王韬于1880年在香港代为出版, 在此基础上, 郑观应将文稿扩充改编成《盛世危言》5卷本, 于1893年印行。继而又将它进一步增订为3编, 共14卷, 初刊于1896年。1900年, 他将修订后的《盛世危言》8卷本付梓。本文以其著作《盛世危言》为基础, 就其经济思想作一探析。

1 批判重农抑商的传统经济思想, 提倡“振兴商务”“以商立国”

近代以前的中国以农为本、以商为末的经济思想和观念是根深蒂固的。鸦片战争后, 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郑观应、王韬、薛福成、马建忠等人纵论天

下, 积极鼓吹洋务, 并投身于洋务运动的实际活动之中。

买办出身的郑观应以他敏锐的眼光认识到: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摆脱压制, 尤其是封建主义的压制, 谋求国家富强, 就必须改变重农抑商的观念。他指出: “中国以农立国, 外洋以商立国。农之利, 本也; 商之利, 末也。此尽人而能言之也。古之时, 小民各安生业, 老死不相往来, 故粟、布交易而止矣。今也不然, 各国并兼, 各图利己, 藉商以强国, 藉兵以卫商。其订盟立约, 聘问往来, 皆为通商而设。……彼不患我之练兵讲武, 特患我之夺其利权。凡致力于商务者, 在所必争。可知欲制西人以自强, 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1]64} “善于谋国者, 无不留心各国商务, 使士、农、工、商投人所好, 益我利源。”^{[1]595}

郑观应非常重视振兴商务, 在早期所写的《救时揭要》中就有表现。该书文章除论及外国贩卖华人和鸦片问题之外, 首篇谈论经济的便是《拟请同华官于外国保卫商民论》。以后的《易言》36篇本也把《论商务》列于经济类的第2篇(第1篇为《论税务》)。在《盛世危言》中, 讨论商务的文章共有7篇, 其中商战2篇, 商务5篇, 篇幅份量在经济类中居于首位。在篇目排列上, 郑观应将商务诸篇置于

[收稿日期] 2006-03-31

[作者简介] 聂好春(1965—), 男, 河南原阳人,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 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历史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研究。

开矿、纺织、农功、垦荒、银行等专论之前,可见其视商务为发展近代国民经济之关键。

郑观应对商务的重要性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他指出:“商务者国家之元气也,通商者疏畅其血脉也。”^{[1]604}他把商务提到这么高的地位,主要是基于对时代变化的认识,认为商务对“自强”和“兴利”均有重大的作用。郑观应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是“以农立国”,故有农“本”商“末”之说。但是,“今也不然”,当前商品交换的范围日益广泛,西方列强又以商务作为侵略中国的工具。因此,不能再把商务视为末务,不能再“袭崇本抑末之旧说”^{[1]607},而必须“振兴商务”“以自强”。

郑观应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提出了振兴商务、以商立国的意见。首先,要设商部,立商学。他认为“欲求兴商,必于六部之外,特设一商部。”由商部来总理全国的商务、贸易等。在各省分设商务局,由绅商公推素有声望的商业精英来作为局董,政府要尽力支持。应速立“商学”,分门别类地教育从商者,消除他们的愚昧,开启他们的智力,做到“操奇计赢,胸有成竹”。其次,要加强经济立法,“速定商律”。有了商律的保护,官吏们就不敢对从商者随意盘剥,奸商们也就不敢舞弊,人们才有所遵循,商务才可振兴。第三,废除不利于商业发展的厘金制度。郑观应分析了厘金制度的弊端,竭力主张废除厘金制度,统一全国税收制度。第四,郑观应在重视发展商务的同时,还强调了工业的重要性。不仅要发展一般性的工业,还必须建立自己的机器制造业。

郑观应“以商立国”的思想并不仅限于发展商业贸易,而是把商业看成整个国民经济的中心和主导部门,国民经济的其他部门都应从属于发展商业,尤其是对外贸易的需要。正如他所言,士农工都不过是“为商助”,公使、领事等外交官均是“为商遣”、“为商立”,军队、舰艇也是“为商置”。在郑观应的眼中,“以商立国”、“振兴商务”,就是要以发展商业为中心,全面发展经济,振兴国家。

2 主张与西方列强进行“商战”,抵制经济侵略

郑观应认为,外国的经济侵略,其危害甚至比军事侵略还要严重。基于这一认识,郑观应提出“习兵战不如习商战”的口号:“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掎克敝国无形。我之商务一日不兴,则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纵令猛将如云,舟师林立,而彼族

谈笑而来,鼓舞而去,称心厌欲,孰得而谁何之哉?吾故得以一言断之曰:习兵战不如习商战。”^{[1]586}

郑观应认为,要和西方列强进行商战,就必须首先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这是进行商战的前提条件。他极力主张取消协定关税条款,收回关税自主权,“权自我操。”他的重定税则、收回海关管理权的主张,是商战所必不可少的措施。如果没有关税保护,如果不收回海关管理权,商战就很难取得应有的效果。其次,要培育国内市场,开拓国际市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者面临的并不是公平交易的国际竞争环境,力量薄弱的华商根本无法自主决定命运。面对这样的市场态势,郑观应身为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兴办者和经营者,分门别类地提出十条因地制宜与外商进行竞争抗衡的具体办法,以广开货源,抵制洋货的无情冲击。最后,讲求商术,以智取胜。商场如战场,要想在商业竞争中稳操胜券,不仅要使产品质优价廉,还须有克敌致胜的计策和谋略。通晓经营之道的郑观应非常明白,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应变能力不仅是市场竞争的必备素质,也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市场的缝隙中求得一线生机的希望所在。为此,他提出许多战胜对手、争胜市场的要诀:一是要了解商情,通盘筹划。在市场竞争中,既要对市场全局的变化和规律了然于胸,还必须洞察彼我双方的信息动态,这样才能度人量己,作出占据市场的正确决策。在竞争激烈行情多变的市场条件下,经济信息对于竞争的胜负起决定作用。因此,郑观应主张兴办现代化的通讯设施——电报业。为此郑观应一再强调“商务得失不可不通盘筹画,而确知其消长盈虚也”^{[1]586}。他还特别提及民间商会在交流信息、相互切磋方面的作用。商会可使“同业咸集,藉以探本业之隆替,市面之赢绌,与目前盛衰之故,日后消长之机。勿作浮谈,勿挟私意,何者宜补救,何者宜扩充,以类相从,各抒己见。择其切当可采者,汇而记之于册,……每年每季仿外国商务工艺报刊印成编,分遗同业户各一本”^{[1]617}。这样使大家了解市场的整体情形,就可知道参与和逃避的方法。二是要运用营销策略占领市场。要充分了解列强的商品在中国市场的占有情况,要调查西方列强“其所以需于我者,精制而贵售之。彼所必需不因糜费而节省,而我货之源可一战而徐开矣”。郑观应把孙臬助田忌赛马之策引入了营销理论中。主张在与西方列强开展竞争时,要“盖彼务贱,我务贵,彼务多,我务精。彼之物于我可有可无,我之物使彼不能不

用。此孙子上驷敌中,中驷敌下,一屈二伸之兵法也”^{[1] 590}。

3 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

郑观应认为,向西方学习应该学习根本的东西,即先进的工业技术和经济管理制度。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西学》《学校》《技艺》等篇中,对学习西方的“技艺”、文教做了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国而不思理财,理财而不求格致,犹如琢玉无刀凿之利器,建屋无栋梁之美材。”^{[1] 282}认为西方国家经济之所以发达,就是因为应用了先进技术,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工艺一道为国家致富之基。工艺既兴,物产则因之饶裕。”^{[1] 728}要拯救中国的贫穷,就必须大力引进、发展近代工业技术。为此他提出四项具体措施:一是“设工艺专科”。把技术发明作为一项专门的学问,隶属于工部管理。让有技术发明贡献的人经过考试,有作为者任命为工务官员。国家对其发明给予保护和承认专利。二是“开工艺学堂”。为了把先进的技术应用于市场,郑观应非常重视教育问题。他说:“工艺之学,不能不赖于读书,否则终身习之而莫能尽其巧。”^{[1] 719}认为读书和学习技能要合二为一,小则能扩大工商的源泉,大则使国家受益无穷。三是“派人游学各国”。郑观应总结俄国、日本学习技术发展经济以致国家富强的经验,要求清政府也应当选派精明强干的官员带领全国的“神童”,到西方留学,掌握其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四是“设博览会以励百工”。因而,他主张国家应于各省会、市镇设立技术发明展览场所,这样“备列各省出产货物、工作器具,纵人入观,无分中外。一以察各国之好恶,一以考工艺之优劣,使工人互相勉励,自然艺术日新”^{[1] 729}。

企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先进的技术工艺,还要有完善的经济管理制度。郑观应极力倡导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股份制作为近代中国的工业企业制度。他指出公司、企业要适应市场竞争和本身发展的需要,在管理上必须渗透民主精神,绝不可以独断专行。企业的经营活动要按公司的章程办理,并且定期召开股东大会。

4 主张建立近代金融和财政体制

在金融方面,郑观应主要论述了以下几点:

一是强调银行的重要性。银行作为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为解决商品交换的矛盾而出现的。

近代中国最早提出设银行的是洪仁玕,他在《资政新篇》中主张太平天国“兴银行”以“利商贾士民”,但没有什么论述,真正对银行进行深入细致分析的是郑观应。他说:“洋务之兴莫要于商务,商务之本莫切于银行。泰西各国多设银行,以维持商务,长袖善舞,为百业之总枢,以浚财源,以维大局。”^{[1] 679}郑观应把银行看成“商务之本”和“百业之总枢”,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银行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具有特殊的作用。郑观应列举了银行对社会经济的十大促进作用,认为银行能“聚通国之财”,以解决国家的急需,解决货币“周转不灵”,“利国利民”。郑观应主张中国设银行可以“官银行”和“商银行”并举,“一切条规悉仿西法”,政府不干涉银行的人事任免等事宜。凡是银行所录用的工作人员,均要公开选拔产生,不得私自任命或举荐。郑观应不满外国银行在华的掠夺性营业,揭露其“不与华商往来,即有殷实华商公司股票,亦不抵押;华商助以资,而西商受其益”^{[1] 679 680}。为了改变这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的状况,郑观应断言:“今为之计,非筹集巨款创设银行,不能以挽救商情,而维持市面也。”^{[1] 682}

二是主张货币统一,以金代银。郑观应认为洋钱的使用使中国有“四害”,竭力主张清政府要自行铸造银圆,指出“自行鼓铸”有“四利”^{[1] 692},这样既可以“夺西人利权”,使洋钱的来源、流通日益减少,又可广保财源,从而方便商民的使用并保护市场的运行。针对当时世界大多数国家采取金本位的货币制度,郑观应指出:政府当务之急应采取金本位制度,并禁止外国洋钱的流通。这样既可以体现国家的尊严又可以堵塞金融漏洞,对国家“利莫大焉”。

三是提倡推广保险业务。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特列《保险》一篇进行论述。“盖所谓保险者,不过以一人一身之祸派及众人”^{[1] 647},保险公司收取保险费的目的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在此过程中公司从中获得一定的利润。这样不用政府花费大量资金,又可防止意外之灾,最大限度地降低个人、企业的损失,与国与民都是有利的,“此等便宜之事亦何乐而不为乎”^{[1] 647}?

在财政体制方面,郑观应主要论述了税收、国债、“度支”(即财政预算)3个问题。税收方面,他主要是要求收回海关管理权、废除厘金制度。国债,作为国家筹集建设资金的一项重要措施,对促进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会稳定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而当时引导世界发展潮流的欧美列强,各国均发

行国债。它们的国债多数是面向本国民间,也就是向国内民众借款。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藏富于民”、“不欲授利权于别国也”^{[1] 581}。清政府为偿还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中国的巨额赔款,也不得不“屡借巨款”。可这些借款均来自西方列强,以致于“绝大利权不授于己民,而授之于外国,且不授于外国殷实之富户,而甘授于外国奸狡之牙商”^{[1] 584}。郑观应指出,从外国借款是近代中国被迫开放国门以来最大的弊端之一。故此他迫切希望清政府,能够效仿西方列强的做法,向民间借款,并且提出了自己的方案。郑观应指出:即使万不得已而再借款,也必须全盘考虑,“审慎周祥”。他认为:一是不要再把借款之事委托列强在中国的银行办理,以免中间商的折扣使借款“亏累无穷”。二是进行工程建设时无需专借现款。这样既可减少借款的现金数量,又省掉了中间环节的一些转折耗费。三是政府所借之款应用于有益于国计民生的地方,不要“妄作耗财无益之事”。对“度支”即财政预算问题,针对当时西方列强“每岁出入度支皆有定额”,且“所有进出各款,岁终刊列清帐,布告天下,以示大公”^{[1] 577}的情况,他批评清政府“惟中国尚无度支清

账颁示国中”。因而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弄清国家一年的财政收支数目。这就需要清政府严格审查收支情况。此外政府还要重视对外贸易,考察中国钱财流向国外和国外的资金流入中国的数量。如果“出入惟均”则可不去管它。但若呈现出超的情况,“则必究祥其所以失之故,当兴何项商务以补救之”;呈入超的情况,“亦必详究其所以得之故,当若何悬赏以鼓励之”^{[1] 578}。同时,郑观应还指出要搞好财政预算必须注意廉政建设,做到“官禄丰足以养其妻孥”、“君用俭,内府无所中饱”。只有这样才能“合中外各国为通盘理财之法也”^{[1] 578},与世界大多数国家的财政体制接轨。

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反映了19世纪末逐渐产生和形成的中国早期资产阶级的心声,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郑观应的经济思想始终贯穿着反抗列强侵略、主张富强救国的主线。其经济思想确有不少真知灼见,符合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推动民族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其经济思想对我们仍有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郑观应. 盛世危言[M] //夏东元. 郑观应集:上册.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Zheng Guan-ying's Economic Ideas in *Shengshi Weiyuan*

NIE Hao-chun

(Institute of the Chinese Modern Histor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as a representative transformed from a comprador capitalist to a national capitalist. Zheng Guan-ying's economic ideas are embodied in his book *Shengshi Weiyuan*. He made critical remarks about the traditional policy of "agriculture over commerce"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He advocated "commercial revitalization" and took "business as th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He called on "a business war" against the western powers, resisting the capitalist economic aggression and safeguard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He advocated learning western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systems and establishing a modern financial and fiscal system. Zheng Guan-ying's economic ideas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arousing national consciousness, exploring the road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promoting modern industrial and business development and defending the national economic interests.

Key words: *Shengshi Weiyuan*; Zheng Guan-ying; economic ideas

(责任编辑 孙俊青)